

近三十年日本中華民國史研究概觀——以日本學界的自我評述為依據

鹿錫俊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

導言

由個人來介紹「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因為作為世界上開展中國研究最早、參與學者最多、關注對象最廣的國家，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碩果累累，而且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和國共關係等各個領域。因此僅靠一己之力是難以把握全貌的。

但是，儘管如此，筆者還是願意承擔這個任務。為什麼？主要有下述兩大理由：

第一，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很值得海內外學界借鑑。然而由於語言等多種原因，在中方的相關研究中，日方已經取得的成果似乎至今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注。作為一個在日本執教的中國人，筆者深感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為幫助國人多方了解和吸收日方的研究成果而盡力。

第二，關於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日本學者自身已有不少總結。所以本文作為一種介紹性的文章，在寫作方法上，可充分汲取日本學者的既有總結，而其中的不足之處，則可通過自己對日本學者的問卷調查來彌補。正因如此，本文的副標題為「以日本學界的自我評述為依據」，其意是要強調本文對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的介紹，並非筆者的獨創，而主要是建立在日方學者自我評述的基礎之上。具體而言，它們包括兩大類，其一是文末所附「主要參考文獻」所標明的各種既有成果；其二是文末「謝辭」所

列舉的各位日本學者對筆者所作問卷調查的書面答復。

以上是筆者接受本項寫作任務的緣由與目的，也是筆者對本文性質的界定及寫作方法的說明。

在結構上，本文由以下部分組成：第一節，簡略回顧自 1945 年至 1980 年代日本學界對中華民國的研究史；第二至五節，概括介紹自 1980 年代至 21 世紀初期的相關成果；第六節，扼要總結日本民國史研究的特色、長處與問題。

一、「中華民國史研究」在戰後日本的曲折歷程

作為長期受中國文化薰陶的鄰國，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自古就是日本學界的一個強項。當中華民國於 1912 年誕生之時，日本已是亞洲的新興帝國，而中國則已因长期的外來侵略和內部動亂而大大落後。但是，由於對中國的傳統性的關心和興趣，也由於向中國大陸發展這一政府國策的推動，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依然是日本學界的一個熱點。不過，對此時的日本人來說，中國不僅已經不是憧憬的對象，而且還不是一個應該平等相待的國家。因此直到 1945 年戰敗為止，日本學者對同時代的中華民國的研究，包括著名的中國農村調查和中國傳統習慣調查在內，雖然也留下了一些至今還值得參考的寶貴成果，但從整體來看，它的特點是

以中華民國的救世主自居，並為政府的侵華國策提供幫助。

1945 年 8 月以後，日本淪為戰敗國，中華民國則成為戰勝國和剛剛誕生的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雙方的國際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轉折本來可以成為日本學界重新認識中華民國的契機。但是，一來因為日本人基本上認為自己只是輸給美國而非敗於中華民國；二來因為戰後中國很快陷入國共內戰，並逐漸呈現出由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國國民黨的趨勢。所以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上升，並沒有使日本學界對中華民國的研究立即轉入講究客觀的階段。而且在當時的日本，由於對本國過去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反思，也由於受中國大陸國共鬥爭總趨勢的影響，很多知識分子產生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嚮往。因此從 1945 年至 1949 年，儘管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不能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說成一無是處，但整個日本學界的主流傾向，是基本上認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其象徵則是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被廣泛引用。

1949 年 10 月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誕生，中華民國退守臺灣。對日本人來說，對中華民國的研究，正式從「同時代的觀察」轉入了「歷史的考察」。在中國大陸政權交替的巨大衝擊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進一步在日本史學界確立了主導性的地位。因此自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日

本學界關於中華民國史的一般論述，在觀點上和中國大陸當時流行的那些通論基本相似。其特點可歸納為兩點：

一是「善惡二元論」。即把中華民國的歷史，看成代表邪惡的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代表正義的孫中山國民黨進步勢力、中國共產黨革命勢力這兩大陣營的鬥爭史。對前者完全否定，對後者全盤肯定。

二是「革命中心史觀」。即出於對中國革命的共鳴，而把興趣集中於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過程的研究，而對作為中國革命對象的中華民國本身的歷史則不予重視。

當然此期也有對中共的歷史觀表示異議的論著。譬如，矢澤康祐和中島太一認為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支撐國家自立的基礎。在國際關係史的領域，坂野正高與衛藤瀋吉撰寫的〈中國〉（收入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戰後世界政治與美國》，東京：岩波書店，1954年）、山極晃的〈大戰中的中美關係〉（收入《歷史學研究別冊：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和現代》，東京：青木書店，1960年）等等，都依據美國史料，比較實證性地考察了國民政府時期的中美關係。但是，從整體上看，它們只是個別現象，因此並不能扭轉此期日本學界在中國研究上的主流。

1966年開始在中國大陸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時間也給很多日本學者帶來了類似當時大陸人民那樣的激情。但

是，幾年以後隨著文革的真相逐漸暴露，日本人也和中國人一樣開始了對中國現實的反思。它的必然結果是同時走向對中國歷史的反省。以此為契機，一些日本學者對在戰後日本佔統治地位的「善惡二元論」和「革命中心史觀」產生了懷疑。由此出發，他們認識到戰後日本學界過分偏重於對中國革命及其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中國革命的對立面——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探討。其結果是對二者都缺乏正確的認識。

在這樣的背景下，1970年代後日本學界開始出現研究中華民國史的萌芽性的成果。首先，亞洲經濟研究所出版了《中國統一化論爭之研究》（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1971年），野澤豐於其中重新評價了中華民國史上的這個重要歷史事件。1974年野澤豐又主編了《中國國民革命史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74年）。同年清川雪彥的〈日本在華紡織廠對中國棉紡工業技術發展的意義〉（《經濟研究》，第25（3）號，1974年），考察了民國期間日本在華紡織廠在技術轉移中發揮的作用。後來吉田滋一〈20世紀中國某棉作區農民階層的分化〉（《東洋史研究》，第33卷第4號，1975年），論述了民國農業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姬田光義的《中國現代史的爭論點》（日中出版，1975年），以對瞿秋白、劉少奇的評價為例，對正在文化大革命漩渦中的中國大陸的官方史觀提出了異議。

1970年代後期，日本學者的研究進一步發生了變化。其特點是擺脫革命史觀的限制，摸索以新的方法拓寬課題。1978年出版的由野澤豐、田中正俊主編的7卷本《講座中國近現代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雖然還留有革命史觀的痕跡，但總體上反映了這種新的傾向，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抗日戰爭等作了綜合性的論述，因而具有象徵意義。正面評價國民政府的論著亦開始問世。其中有奧村哲〈危機前夜江浙一帶的機器繅絲業〉（《史林》，第62卷第2號，1979年），石島紀之〈國民黨政權的對日抗戰力——以重工業建設為中心〉（前揭《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第6卷，1978年）等等。它們考察了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種種政策，其共同結論是承認國民政府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肯定它當年推行的政策具有正確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贏得抗日戰爭勝利和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引導下，革命史觀獨佔鰲頭時期的那些定論開始得到了糾正。

但是，在這一階段的中華民國史論著中，還存在著以下問題：

第一，雖然不少論著都承認了國民政府具有資產階級性和民族性，然而在能否把國民政府定性為資產階級政權的問題上還有爭議。

第二，在如何評價1935年的幣制改革的問題上，儘管各方對幣制改革是國民政府

的自主改革而非英美主導這一點意見基本一致，但在對幣制改革效果的看法上，有人強調它使中國在經濟上加深了對英美的依附性，有人則全面否定此說。

第三，對抗日戰爭之前的1930年代的實證研究比較集中，其後的時期特別是國共內戰時期的研究則很薄弱。

總而言之，1970年代後期儘管出現了不少關於中華民國史的實證研究，但從整體上看，它們並沒有完全改變此前對國民政府的舊的基本結論，因此也並未全面修正以往對國民政府的基本概念或認識框架。

在日本，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正式展開，應該說是起步於1980年代。其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大陸的變化。19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展，中國大陸不僅在經濟上開始起飛，在歷史研究上也開始在相當多的問題上衝破禁區，自我否定了一些過去在日本也被奉為定論的觀點。特別是以南京大學為中心，中國大陸開始推動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各種學術研討會相繼舉行，日本學者成為主要的受邀者。「革命史觀」發源地的這種深刻變化，給日本學者帶來了巨大的刺激。

第二，世界的變化。與中國的變化幾乎同步，蘇聯和東歐各國進入動盪，對社會主義的批判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它在引起日本學界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排斥的同時，還進一步撼動了過去對中國的「善惡二元

論」和「革命中心史觀」。

第三，中華民國史檔案史料的大量開放。1980年代後，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開始大量出版民國檔案，對一時無法出版的檔案史料，也允許國內外學者來館閱覽。中國各省市的地方級檔案館也陸續開放和出版民國史料。另外，在海峽對岸，臺北的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國史館等史料機關也開始開放民國史料。史料狀況的這種巨大改善，使本來就以精心收集史料著稱的日本學者如魚得水。

第四，中日學者相互交流的深入。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推動下，研究中華民國史的日本學者和博士生等大批深入大陸與臺灣進行調查或長期留學。在中國各地邊研究、邊交流、邊收集史料的生活，使很多日本學者獲得一舉多得之利。與此同時，1980年代後大批中國學者到日本作訪問研究，給日本學界帶來了新信息。還有很多包括重點大學的史學研究生在內的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不少人後來進入日本學界。眾所周知，研究一個國家的歷史，最好有在這個國家的生活經歷。既有中國生活背景，又汲取了異國文化精華的這批新鮮血液的加入，彌補了日本學者在中國生活背景上的不足，增添了日本學界民國史研究的活力。

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就這樣在歷經曲折後，進入了新時期。如果以1980年為起點，這個新時期迄今已有30餘年的歷史。下面分三節簡要介紹1980年代、1990年代

與21世紀初期這三個十年的概況。

二、1980年代的開拓

1980年山田辰雄出版了《中國國民黨左派的研究》（東京：慶應通信，1980年）。這是日本系統研究國民黨左派之政治路線、組織基礎及行為方式的最早的專著，作者也因此被稱為日本研究中華民國史的開拓者之一。該書指出：孫文的思想缺乏完整性，這個特點使他的各種繼承者都可以對孫文思想各取所需，作出多種解釋。因此對孫文的評價，必須和國民黨的發展史相聯繫。據此，該書以比較接近孫文晚年立場的國民黨左派特別是與汪精衛分裂後的改組派為研究對象。作者的結論是，在中國革命向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兩極分化的過程中，國民黨左派處於其中間地位。他們想貫徹獨自的政治路線，但缺乏軍事實力和組織基礎。在這一方面，孫文也存在著類似的弱點。

1981年日本的中國史學者和日本史、西洋史的學者合作，推出了《中國的幣制改革與國際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此書由野澤豐主編，是關於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共同研究。由此開端，很多學者開始注重從經濟的角度及國際形勢的角度，考察中國近代國民經濟的形成過程。同年淺田喬二主編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中國——中國佔領地經濟的研究》

（樂遊書房，1981年），則從日本經濟史的角度探索了中日經濟關係。

1982年高村直助的《近代日本棉業與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川井悟的〈關於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成立及其改組的考察〉（《東洋史研究》，第40卷第4號，1982年）、池田誠等人的《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年）、廣田寬治的〈南京政府工廠法研究序說（1-3）〉（《中國勞動史研究》，第10-12號，1982年）等先後發表。如題目所示，它們既涉及到中日關係，又涉及到工業、法律問題和全國經濟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等經濟機關。

1983年一些學者合作推出了《中國歷史中的社會和民眾》（增淵龍夫先生記念論集刊行會編，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其中含有久保亨執筆的〈國民政府的財政與關稅收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了共同研究報告《五四運動研究》第2函（京都：同朋舍出版，1983年），內含林原文子的〈宋則久與天津的國貨提倡運動〉等論文。中村隆英出版了《戰時日本的華北經濟統治》（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

1986年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了論文集《五四運動史的再檢討》（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86年）。

1987年川井伸一的〈戰後中國紡織業的形成和國民政府——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的成立過程〉（《國際關係論研究》，第6號，1987年），論述了國民政府戰後接收原日本在華紡織廠並組建大型國營企業中紡公司的過程。同年姬田光義的《生於中國革命之中——共產國際德國軍事顧問李德》（東京：中公新書，1987年），主張重新檢討既有的歷史結論。高田幸男的〈南京政府時期的教職員運動〉（《駿台史學》，第71號，1987年），以上海市教聯的活動為中心，論述了當年教職員運動的概況。

1989年金子肇的〈國民政府預算決定機構的形成過程〉（《史學研究》，第185號，1989年），介紹了1927-1930年間南京的中央財政機構。同年《中國經濟政策史研究——第三屆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學術研討會記錄》出版（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其中含有川井悟關於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技術官僚的論文。

除上述論著外，還有很多值得關注的成果。

（一）關於孫文

1981年藤井昇三打破了革命史觀盛行時期的禁忌，連續發表了〈二十一條交涉時期的孫文與「中日盟約」〉（收入市古教授退官記念論集編集委員會編，《論集 近代中國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81年）和〈孫文的對日態度〉（收入《現代中國與世界——政治的展開》，東京：慶應通信，1981年）兩篇論文。其中指出，

孫文 1912 年和日本進行了滿洲租借交涉，1915 年還和日方達成了內涵超過二十一條要求的「中日密約」。此說當時受到了臺灣學者的強烈批判。繼藤井以後的孫文研究，有橫山宏章的《孫中山的革命與政治領導》（東京：研文出版，1983 年），〈關於孫中山晚年（1920 年代）的評價〉（《亞洲研究》第 32 卷第 1 號，1985 年）和久保田文次的〈孫文的對日觀〉（辛亥革命研究會編，《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 中國近現代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5 年）等。橫山指出孫文一貫堅持軍事優先，久保田則強調應重新評價孫文的對日認識。狹間直樹也發表了〈孫文思想中的民主與獨裁〉（《東方學報》，第 58 號，1986 年），認為孫文思想中民主和獨裁併存。這些觀點使孫文在革命史中的作用被相對化了。同屬人物研究，松尾洋二的〈曹錕、吳佩孚集團的興亡〉（《東洋史研究》，第 47 卷第 1 號，1988 年）概觀了直隸派軍閥的歷史；砂山幸雄的〈五四青年的群像〉（《亞洲研究》，第 35 卷第 2 號，1989 年），研究了譚代英，認為其思想中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相互聯繫。

（二）關於民國政黨

在強調要擺脫革命史觀後，日本學界加強了對中國共產黨以外的黨派的研究。平野正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3 年），系統考察了中國民主同

盟的歷史。後來他又發表《中國知識分子與民主主義思想》（東京：研文出版，1987 年），論述了鄧演達等人所組第三黨的歷史。菊池貴晴也出版了《中國第三勢力史論——關於中國革命中第三勢力的綜合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7 年），從整體上分析了第三勢力。山田辰雄發表〈中國政黨史論〉（《現代中國 1 現代中國的政治世界》，東京：岩波書店，1989 年），概括分析了近現代中國的政黨政治。

（三）關於地方政治

笹川裕史的〈1920 年代前期湖南的省政民主化運動〉（橫山英編，《中國的近代化與地方政治》，東京：勁草書房，1985 年）、〈國民革命時期湖南省各級人民會議的構想〉（《史學研究》，第 168 號，1985 年）、〈1920 年代湖南省的政治變革和地方議會〉（《史學研究》，第 171 號，1986 年），系統地考察了湖南省 1920 年代製定省憲法的過程及地方議會的動向。菊池一隆的〈雲南省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大阪教育大學歷史學研究室編，《歷史研究》，第 24 號，1986 年）論述了雲南省的工業合作運動。

另外，金子肇的〈上海資本家階級與上海商業聯合會——圍繞四一二政變〉（《史學研究》，第 168 號，1985 年）、〈上海資本家階級與國民黨統治（1927-1929）——驅逐馮少山在政治史上的意義〉（《史學研

究》，第 176 號，1987 年），〈商民協會與中國國民黨（1927-1930）〉（《歷史學研究》，第 598 號，1989 年），是作者此期研究上海總商會的系列論文。與中國學界的同類研究相比，這些論著具有先驅意義。

（四）關於黃埔軍校

有三石善吉的一系列論文，如：〈黃埔軍校的設立過程與蘇聯〉（《中哲文學會報》，第 6 號，1981 年），〈商團事件與黃埔軍校〉（《筑波法政》，第 8 號，1985 年），〈蘇聯軍事顧問團與黃埔軍校〉（《筑波法政》，第 9 號，1986 年）等。

（五）關於國民政府與抗日戰爭

石島紀之發表了《中國抗日戰爭史》（東京：青木書店，1984 年）。這是日本從新視角論述抗日戰爭的最早的專著之一。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題為《中國國民政府研究》的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86 年），考察了國民政府的政治體制和外交、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其中，土田哲夫的〈南京政府時期的國家統合——以與張學良東北政權的相互關係為例〉，以南京政府和東北的張學良政權的相互關係為事例，從政治、經濟、軍事、財政與國民黨等角度，分析了南京政府成立初期中央政府所推行的國家統合的實態，指出國家統合的遲緩導致了對外方面的脆弱。在日本該論文最早提出了「國家統合」的概念，並檢證了

其進展或停滯的程度。同樣收入該書的姬田光義的〈抗日戰爭前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政策——以蔣介石的軍事思想與軍事指導為中心〉，指出對中華民國軍事史的研究迄今缺乏實證性。該書還收有以下論文：高田幸男的〈南京政府的教育政策——以試行中央大學區為中心〉，井上久士的〈國民政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飯塚靖的〈關於南京政府原棉政策的筆記〉，今井駿的〈對日抗戰與蔣介石〉，上野章的〈經濟建設與技術引進——以江蘇省蠶絲業之一代交雜種的引進為事例〉，菊池一隆的〈重慶政府的戰時金融——以四聯總處為中心〉等。

池田誠主編的《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京都：法律文化社，1987 年），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為主線，從多種角度論述了抗日戰爭。井上清、衛藤瀋吉主編的《日中戰爭與日中關係》（東京：原書房，1988 年），是紀念盧溝橋事件 50 週年中日學術討論會的成果。宍戶寬、內田知行等人合著了關於中共軍隊的《中國八路軍・新四軍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9 年）。

另外，阿部洋主編的《日中教育文化交流與摩擦——戰前日本在華教育事業》（東京：第一書房，1983 年），涉及到民國時期的文化和教育。小林弘二主編的《舊中國農村再考：變革的起點之檢討》（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 年），《中國農村變革再考：傳統農村與變革》（東京：亞洲

經濟研究所，1987年），批判性地整理了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爭論。

三、1990年代的進展

1989年春夏，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給日本的中華民國史學界帶來了強烈的衝擊。很多學者認為，現代中國的很多問題根子在中國的過去。因此要認識中國的今天，必須認識中國的昨天，而要認識中國的昨天，首先要加強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

在這一背景下，1990年山田辰雄於《近鄰》（《近きに在りて》）雜誌發表了〈是提倡「民國史觀」的時候了〉（第17號，1990年）一文，主張全面推進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即既要克服毛澤東中心主義，又要克服孫文中心主義或蔣介石中心主義，把民國史研究的觸角真正伸向民國史的方方面面。同期野澤豐先生主編的《近鄰》雜誌，也開始把重點轉到發表關於中華民國史的論著。在這兩位學界重鎮的推動下，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在1990年代跨上了新台階。

（一）關於北京政府時期

田中比呂志〈民國元年的政治與宋教仁〉（《歷史學研究》，第615號，1991年），以宋教仁為中心分析了民國初期的政治史。狹間直樹主編的《1920年代的中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對

1920年代的民國史作了多方面的考察。

齋藤道彥的《五四運動的虛像與實像——1919年5月4日北京》（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2年），通過對一個時間點的深入觀察，描繪了作者眼中的五四運動的真實景象。

山田辰雄主編的《歷史中的現代中國》（東京：勁草書房，1996年）指出，20世紀的中國缺乏解決政治對立的制度框架，人民在自發參與政治方面也缺少制度保障。從袁世凱獨裁到國民黨訓政，一直存在著一種「代行主義」，即由精英集團代替人民設定改革目標，並為實現此一目標而動員人民，培養人民的政治意識。這一「代行主義」的觀點，後來成為日本學者強調中國政治之連續性的一個基本概念。以此為基礎，他們開始進一步加強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二者之間所存連續性的研究。

橫山宏章的《中華民國史——專制和獨裁的對立》（東京：三一書房，1996年）提出，今人應以專制和民主的對立為主線理解中華民國史。當時各種政治勢力都竭力想實現自身嚮往的政治體制。從這一觀點出發，該書強調了袁世凱爭取國家統一的一面。與此相關，橫山宏章還出版了《中華民國——賢人統治的善政主義》（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年）。它提出了「專制和民主的對立」或「賢人統治的善政主義」的觀點，以作為取代中國大陸舊有的「革命史觀」的新的分析框架。通過這兩本專著，

作者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作出了相對化的評價，揭示了貫穿於這兩個革命政黨統治時期中的某種連續性。作者強調，在中國這種傳統的連續性超過了革命引起的變化。金子肇〈袁世凱政權對國家統一的嘗試及諮詢機構的作用〉（《東洋學報》，第 79-2 號，1997 年）也認為袁世凱帝制是為了國家統一。從這幾篇論著可見，過去長期被日本學界視為反革命政治家的袁世凱，到了 1990 年代後成為一個引入注目的研究對象，並得到一定的肯定。

江崎隆哉〈第一次國共合作與西山會議派的形成〉（《法學政治學論究》，第 24 號，1995 年），追踪了西山會議派的消長過程。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編的《民國前期的中國與東亞的變動》（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9 年），探討了民國前期的外交和政治等。其中，味岡徹執筆的〈民國國會與北京政變〉，通過考察 1922-1925 年間民國國會的衰退、破滅過程，論證了民初國會對政治公開的貢獻。齋藤道彥執筆的〈中國近代和大中華主義〉，討論了所謂「大中華主義」在中國的形成過程。土田哲夫執筆的〈中國人的蘇聯留學及其遺產〉，以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中心，探討了民國時期中國人的留蘇問題及其影響。

（二）關於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小濱正子〈南京國民政府的民眾掌握〉（《人間文化研究年報》，第 14 號，1990

年），以上海的工商同業公會等為事例，考察了國民政府對上海工人的統治方法，指出其利用了傳統秩序的作用。

土田哲夫〈東北易幟的政治過程（1928 年）〉（《東京學藝大學紀要 第 3 部門 社會科學》，第 44 集，1993 年），利用中文資料和日本外務省文書，以田中義一內閣、張學良政權和南京國民政府這三者之間的國際政治過程為焦點，分析了東北易幟問題。

西村成雄《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20 世紀中國政治史的新視界》（東京：研文出版，1991 年），以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之內在聯繫為主軸，考察了 1930 年代的訓政體制和它的變化過程，揭示了憲政運動的意義。該書認為，國民政府的訓政也含有國民主權的原理，它既有利於確保國民政府統治的正統性，又在一定程度上為民主主義提供了政治舞台。從這個角度出發，作者重新評價了國民參政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意義。

飯塚靖的〈中國近代農業技術者的形成及棉作改良問題（1）（2）〉（《亞洲經濟》，第 33 卷，第 9、10 號），從移植和發展歐美農業科學技術這一技術論角度，重新評價了既往被貶為封建、反動的國民政府的農業政策的意義。其結論是：國民政府的農業政策促進了 1910 年代末以來對歐美農業科學技術的移植與發展，並利用其技術力量進行了大規模的普及活動，後來的社會主

義中國也利用了它的成果。

此外，橋本浩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權構想、組織及其實態〉（《歷史研究》，第 29 號，1992 年），考察了福建人民政府。樹中毅〈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的空殼化〉（《法學政治學研究》，第 31 號，1996 年），分析了南京政府以黨治國的理念為何淪為形式，並論述了蔣介石獨裁的確立過程。

（三）關於抗日戰爭

岩武照彥的《近代中國通貨統一史——15 年戰爭時期的通貨鬥爭》（東京：みすず書房，1990 年），考察了 1931-1945 年間國民政府統治區、日軍佔領區和中共統治區圍繞通貨問題的激烈鬥爭。安井三吉的《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 年），揭示了七七事變的背景和中日雙方的具體應對。石島紀之的〈中日全面戰爭的衝擊——中國的國民統合與社會構造〉（細谷千博等編，《太平洋戰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 年），以四川省為重點，揭示了重慶政府時期的社會狀況與經濟方面的困難。

（四）關於民國時期的地方與社會、政治

橫山英、曾田三郎主編的《中國的近代化和政治統合》（廣島：溪水社，1992 年），是以廣島大學為中心的研究團體的成果。辛亥革命與省自治運動都是從地方開

始，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關係。民國時期在各地地方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和新興的工商業者的推動下，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的近代化有所長進。該書從這個角度著眼，探索了自清末至民國的地方自立進程，其中特別考察了湖南、江蘇、浙江、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產業行政、土地政策和地方自治。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發表了共同研究報告《五四運動研究》第 5 函（京都：同朋，1992 年）。其中，清水稔執筆的〈湖南五四運動小史〉從民眾運動和學生運動的角度分析了湖南五四運動。塚本元的《中國國家建設的嘗試——湖南（1919～1921 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年），考察了湖南省精英階層的活動和聯省自治運動。鹽出浩和的〈廣東省的自治要求運動與縣長民選〉（《亞洲研究》，第 38 卷第 3 號，1992 年）、〈廣東商團事件〉（《東洋學報》，第 81-2 號，1999 年）考察了廣東省的自治運動和商團事件、國會問題等。蒲豐彥的〈地域史中的廣東農民運動〉（狹間直樹編，《中國國民革命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 年）分析了國民革命時期廣東的農民運動問題。澀谷由里〈張作霖政權下的奉天省民政與社會〉（《東洋史研究》，第 52 卷第 1 號，1993 年），研究了張作霖時期奉天省的民政事業。松重充浩〈「保境安民」時期張作霖地方權力的地區統合政策〉（《史學

研究》，第 175 號，1990 年）和〈張作霖對奉天省權力的掌控及其支持基礎〉（《史學研究》，第 192 號，1991 年）等論文，也考察了張作霖時期東北地區的政治和社會。

日本學界在此期還先後組成了以上海、天津、東北、華南與江南等城市或地區為對象的地域史研究會。其中，上海史研究會出版了由古厩忠夫等主編的《上海史：巨大都市的形成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東京：東方書店，1995 年），天津地域史研究會出版了《天津史》（東京：東方書店，1999 年）。而在關於東北地區史的研究方面，日本學界的中國史研究者還嘗試和殖民地史研究者及朝鮮近代史研究者開展合作。

（五）關於人物研究

在關於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講演的解釋問題上，1991 年高綱博文的〈關於孫文「大亞細亞主義」的講演〉（《歷史評論》，第 494 號，1991 年）和安井三吉的〈為了加深對孫文「大亞細亞主義」的研究〉（《歷史評論》，第 498 號，1991 年）是兩篇爭論文章。後來藤井昇三也通過發表〈再論孫文的民族主義〉（《歷史評論》，第 549 號，1996 年），加入了這場論戰。日本孫文研究會則在 1990 年代先後推出了兩本論文集，即《孫文與亞洲：1990 年 8 月國際學術討論會報告集》（東京：汲古書院，1993 年），以及和神戶華僑華人

研究會合編的《孫文と華僑——孫文生誕 130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99 年）。它們展示了這一時期日本學界在孫文研究上的水準。

另外，竹內弘行的〈康有為與吳佩孚〉（前揭，《中國國民革命研究》，1992 年），考察了國民革命時期的康有為。石川洋的〈師復與無政府主義——以其論理與價值觀為中心〉（《史學雜誌》，第 102（8）號，1993 年），考察了師復的價值觀。其他，關於梁啟超，有楠瀨正明的《中華民國初期的梁啟超與第一國會》（《史學研究》，第 206 號，1994 年）。關於張學良，有西村成雄的《張學良：日中的霸權與「滿洲」》（東京：岩波書店，1996 年）。關於蔣介石，除了野村浩一的《蔣介石與毛澤東：世界戰爭中的革命》（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以外，還有家近亮子的〈蔣介石的外交戰略與日本——從安內攘外到以德報怨〉（《近鄰》，第 33 號，1998 年）。該論文指出，蔣介石在中日戰爭中有獨自的外交戰略，這一外交戰略使中國從次殖民地飛躍提升為戰後的五大國之一。關於參與土地行政的官僚，有山本真的〈從中日戰爭到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土地行政——地籍整理人員・機構〉（《亞洲經濟》，第 39 卷第 12 號，1998 年）。關於立憲派政治家張謇在民國初期的活動，有藤岡喜久南的《中華民國第一共和制與張謇》（東京：汲古書院，1999 年）。值得強調的

是，日本還出版了山田辰雄主編的《近代中國人名辭典》（東京：霞山會，1995年）。它匯集了學界的研究成果，介紹了從19世紀末至1949年止的1100餘名中國人物，並附有參考文獻，至今為眾多學術論著所參照。

（六）關於民國時期的經濟

濱下武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分析了近代亞洲市場的形成和各地區內部的經濟活動中所固有的歷史特色，主張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要以更寬廣的視角進行研究。書中的觀點，對認識中華民國史極具啟發意義。

中村哲的《近代世界史像的重構——從東亞視角出發》（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提出了「中進國資本主義」的概念。石川禎浩的〈南京政府時期技術官僚的形成與發展——近代中國技術者的系譜〉（《史林》，第74卷第2號，1991年），概觀了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活動，究明了活躍於其中的中國技術人員的簡歷與志向。作者還從人才資源的角度揭示：資源委員會的成員在1949年以後，也分別在大陸從事計劃經濟建設和在臺灣從事國家資本主義建設。

川井伸一的〈大戰後的中國棉紡業與中紡公司〉（《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紀要》，第97號，1992年），考察了被視為官僚資本典型的中紡公司，認為它其實面臨

著和一般民間企業同樣的課題。金丸裕一的〈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與電力工業——以1879-1924年的上海市和江蘇省為中心〉（《亞洲研究》，第39卷第4號，1993年），考察了民國時期的電力工業。

曾田三郎的《中國近代繅絲業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追蹤了從清末到民國前期的中國蠶絲業。中井英基的《張謇與中國近代企業》（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1996年），考察了同時期的棉紡織業。富澤芳亞的〈銀行團接管時期的大生第一紡織公司——關於近代中國金融資本對紡織企業的代理經營〉（《史學研究》，第204號，1994年），考察了大生紡織廠在銀行監管下的重建過程。

中田昭一的〈經濟蕭條時期中國的銀行融資〉（《史學研究》，第222號，1998年），以銀行法的製定過程為線索，論述了「商業銀行論」和「綜合銀行論」的衝突。誠山智子的〈關於上海金融恐慌（1934-1939）的一個考察〉（《東洋史研究》，第58卷第2號，1999年），從中國和國際經濟的相互聯繫出發，論述了中國銀行體制的重組過程。

久保亨的《兩次大戰之間中國為自立的摸索——關稅通貨政策與經濟發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運用南京、臺北、東京、倫敦等地保存的多方面的史料，在實證性地確認兩次大戰之間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同時，考察了這一發展的條

件，即圍繞中國的國際環境與中國的對外戰略及對外經濟政策。作者通過對國民政府關稅政策的分析，再現了國民政府的政策決定過程和與列強間的外交交涉過程。（2004年，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書名為《走向自立之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關稅通貨政策和經濟發展》）。岡本隆司《近代中國與海關》（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9年），以財政為重點考察了中國的關稅問題。該書於2000年獲得大平正芳獎。

另外，關於民國化學工業的研究，有貴志俊彥的〈水利化學工業公司與范旭東〉（曾田三郎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領導者》，1997年）。關於民國時期輪船業政策，有泉谷陽子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水運業政策〉（《史學雜誌》，第106-4號，1997）。關於在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的研究，有塚瀨進的〈在奉天的日本商人與奉天商業會議所〉（波形昭一編，《近代亞洲的日本人經濟團體》，東京：同文館出版，1997年）。

（七）關於教育、文化與思想

水羽信南先後發表了三篇論文，即：〈關於施復亮的「中間派論」及其批判〉（今永清二編，《亞洲地域與社會》，勁草書房，1994年）、〈「滿洲事變」前夜（1928-1931年）羅隆基的「國民」觀〉（《史學研究》，第208號，1995年）、

〈抗日戰爭與中國的民主主義〉（《歷史評論》，第569號，1997年）。它們分別考察了施復亮、羅隆基與章乃器三位重要人物。作者指出，應該重新研究所謂第三勢力的政治思想的現實性。

高田幸男的〈近代中國地域社會與教育會——以無錫教育會幹部結構的分析為中心〉（《駿台史學》，第91號，1994年），分析了無錫教育會自清末誕生至抗日戰爭爆發前的職員的構成狀況，證明其起始是一個以士紳為中心的團體，後來逐漸由青年教員所取代。嵯峨隆的《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4年），系統地追蹤了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革命運動作了相對化的分析。

其他，森紀子的〈虛無主義者的重生——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種動向〉（《東洋史研究》，第54（1）號，1995年）和〈1920年代的思潮與「鄉村建設理論」的形成〉（《文化學年報》，第18號，1999年），考察了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狀況。藤井省三與大木康合著的《新編中國文學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7年），含有關於民國時期文學史的敘述。夏本泰子的《音樂之都上海》（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展現了近代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普及過程。

（八）關於中華民國的外交與國際關係

很長時期，日本學者主要關注的是中美或中日關係，1990年代後他們拓寬了研究範圍。和田春樹的《金日成與滿洲抗日戰爭》（東京：平凡社，1992年），考察了中國東北的抗日戰爭及金日成在其中的活動。香島明雄的《中蘇關係史研究 1937-1946》（京都：世界思想社，1990年）和石井明的《中蘇關係研究：1945-195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都是對中蘇關係的實證研究。與傳統的觀點不同，二者都注意到了國民政府的外交主體性。

土田哲夫的〈1929年的中蘇紛爭與「地方外交」〉（《東京學藝大學紀要》，第3部門第47集，1997年），以1929年的中蘇紛爭為個案，根據中、蘇、美、日的多種資料，對東北的地方外交與國民政府的中央外交之間的競爭以及對外關係與國內政治的聯繫等問題詳加考察，從中國當時的分權性與對外關係的聯繫之角度，指出其存在著多重的外交關係。

川島真發表了一系列獨具新意的論文。其中包括：〈「支那」「支那國」「支那共和國」：日本外務省的對華稱呼政策〉（《中國研究月報》，第49（9）號，1995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外交官考試〉（《中國》，第11號，1996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外交部對暹羅的交涉：暹羅華僑的保護問題〉（《歷史學研究》，

第692號，1996年）；〈關東大震災與中國外交——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應對為中心〉（《現代中國研究》，第4號，1999年）；〈華盛頓會議中華民國全權代表團的組建過程〉（《北大法學論集》，第50（2）號，1999年）。

在中美關係的研究上也有新成果問世。其中，山極晃的《中美關係的歷史性展開》（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依據多國史料考察了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過程（此書已由鹿錫俊翻譯成中文，於2001年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土田哲夫的〈中日戰爭與美國援華制日運動〉（《現代中國》，第71號，1997年），運用哈佛大學所藏史料，分析了不加入日本侵略美國委員會（ACNPJA）所發動的對日經濟制裁運動。

（九）關於中國國民黨史

土田哲夫的〈中國國民黨的統計性研究 1924-1949年〉（《史海》，第39號，1992年），在盡力收集中國國民黨的黨務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對其黨員人數、地區與職業構成、學歷和軍隊黨組織等的變遷進行了數量化的探討。這可說是對國民黨的最早的統計性研究成果。樞木利夫和坂野良吉合著的《中國國民革命——東亞的地殼變動》（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7年），主張統一把握國民革命所具有的國家統一和民主革命的雙重性格。

（十）關於中共黨史和革命史

1990年代的特點，是進一步從絕對評價轉向相對評價。福本勝清的《中國革命的輓歌》（東京：亞紀書房，1992年），描繪了中共從作為烏托邦誕生到走向文化大革命悲劇的過程。小山三郎的《現代中國的政治與文學：批判與肅清的文學史》（東京：東方書店，1993年），涉及到1930年代上海文壇的國防文學論爭等問題，並從毛澤東向知識分子提出的文學、政治課題出發，分析了中共的文藝政策。丸田孝志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鋤奸政策〉（《史學研究》，第199號，1993年）指出，1930年代末中共的鋤奸運動，一方面出現了過火現象，一方面樹立了毛澤東的權威。緒形康的《危機：中國革命1926-1929》（東京：新評論，1995年），考察了1920年代的中共黨史。

菊池一隆的〈中國托洛斯基派的形成、動態及主張〉（《史林》，第79卷第2號，1996年），以1927-1934年為中心，論述了中國托洛斯基派的歷史，認為他們的運動是以城市工人階級為主體，和以農村為主體的中共正形成互為補充的關係。田中仁編著的《王明著作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按執筆時序，列舉了王明的1,035篇論著，並釐清了其筆名與版本，明示了其出處。

今井駿的《中國革命與對日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史研究序說》（東京：

汲古書院，1997年），考察了中共主導的蘇維埃革命路線的失敗原因和邊區政權的狀況。高橋伸夫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社會〉（慶應大學《法學研究》，第70-6號，1997年）、〈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內部構造〉（慶應大學《法學研究》，第71-5號，1998年），考察了土地革命時期河南省和湖南省的共產黨地方組織。周偉嘉的《中國革命與第三黨》（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8年），考察了第三勢力的動向。內藤陽介的《毛的肖像——從毛澤東郵票解讀現代中國》（東京：雄山閣出版，1999年），從郵票著手描繪了中國的某些側面。姬田光義編著的《中日戰爭時期日本人在中國的反戰活動》（東京：青木書店，1999年），不僅取材於當年在延安的日本人，而且第一次採訪了中國的相關人士。

（十一）關於民族與宗教問題

新免康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新疆的論文。其中包括〈新疆穆斯林叛亂（1931-1934年）與秘密組織〉（《史學雜誌》，第99（12）號，1990年），〈「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主義」序說：以1930年代為中心〉（《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通信》，第72號，1991年）〈關於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1933～1934年）的一個考察〉（《亞非言語文化研究》，第46/47號，1994年），〈革命的「烈士」與生者：從「東土爾其斯坦」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的過程》（《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通信》，第 85 號，1995 年）等。另外還有，王柯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研究——中國的伊斯蘭與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年）和《三重天下：中國多民族國家的起源》（《近代》，第 82 號，1997 年），松本ますみの《中國民族政策的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論」為中心》（東京：多賀出版，1999 年）。

（十二）關於民國史的總論

久保亨的《中國經濟的 100 年——基於統計資料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創研出版，1991 年初版，1995 年第 2 版），根據統計資料，概觀了 100 年來中國經濟的變遷史。野澤豐主編的《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 年），動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中堅學者，對 1980-1995 年間以日語發表的相關論著作了概括性的總結。

同期，在日本出版的中華民國通史中，有姬田光義和久保亨等人合編的《中國 20 世紀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 年）。該書以「20 世紀」即非斷代史的視角俯瞰了中國的百年。還有奧村哲的《中國現代史——戰爭與社會主義》（東京：青木書店，1999 年），它強調，要從和日本的關聯及比較中重新檢討中國現代史。據此，該書認為，社會主義體制是落後國家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總力戰態勢」，而就中國來

說，日本的侵略是造成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決定性的轉折點。

此外，井村哲郎編撰了一系列有助於深入探討中華民國史的珍貴資料集，並作了頗具參考價值的題解。譬如：《「滿洲國」資料解題》（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 年），《滿鐵調查部：相關者的證言》（亞洲經濟研究所，1996 年），《1940 年代的東亞 文獻解題》（亞洲經濟研究所，1997 年）等。

最後，在研究中華民國史的方法問題上，1990 年代的日本學界也作了很多探討。其中，1999 年野澤豐發表了〈關於中國共和史〉（《近鄰》，第 35 號，1999 年）一文，針對強調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區別的歷史觀，提倡以「共和史」為方法，連續性地把握兩個時代的歷史。在此之前，前述《中國 20 世紀史》和宇野重昭、天兒慧合編的《20 世紀的中國——政治變動與國際契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年），則都提倡從「20 世紀中國」的視角，通觀中華民國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四、新世紀初期的深化

進入 21 世紀後，日本的民國史研究進一步向以往遭到冷落的領域深入發展。因為學者們認為，民國研究應該防止陷入「政治史中心主義」，即不能以政治性的解釋，代

替對經濟或社會等問題的具體探討。易言之，民國史研究要注重對經濟和社會問題本身規律和具體情況的研究，並在研究經濟和社會等問題時，注意克服城市中心主義，時時關注到農村。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多面的、長遠的、綜合性的視角考察中國，成為日本學者對中華民國史研究的一種潮流。

（一）新潮流下的新成果

首先值得特別介紹的是，飯島涉先後發表了4篇關於疾病和防疫的論著：①《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化》（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②“Spanish influenza in China, 1918-20” in D. Killingray and H. Phillips (eds), *The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 Routledge, London, 2003. ③《瘧疾與帝國——殖民地醫學 帝國醫療與東亞的廣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④“Colonial Medicine and Malaria Eradication in Okinaw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he Colonial Model to the United States Model” in Yip Ka-che (ed),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 Histor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2009. 它們把焦點對準被長期忽視的衛生領域，從衛生、防疫與政治、社會的相互關係的角度，考察了民國時期醫療衛生事業的制度化及衛生行政的形成過程。而且，其論述的範圍不是只停留於中國，還涉及到東亞的

廣域秩序。近年中國也開始加強了對這些課題的研究，但飯島涉的成果無疑是具有先驅意義的。

福士由紀的〈國際聯盟保健機關與上海的衛生——1930年代的霍亂預防〉（《社會經濟史學》，第70-2號，2004年），通過對1930年代的霍亂預防問題的考察，結合國際聯盟的視角，也論述了衛生領域的問題。

此外，柳澤和也的《近代中國農家的經營與土地所有》（東京：御茶水書房，2000年），根據冀東農村調查，論證了繼承習慣對土地所有制的影響。三品英憲〈近代華北農村的演變過程與農家經營的發展〉（《社會經濟史學》，第66-2號，2000年），考察了華北農村的土地所有制和農家經營的狀況。

小濱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著眼於慈善團體和救火會等民間活動，通過分析國家和這些民間活動的相互關係，揭示了現代城市上海公共事業的形成過程。日本上海史研究會也出版了《上海——重疊交叉的網絡》（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

岩間一弘的〈民國時期上海的婦女拐騙與救濟〉（《社會經濟史學》，第66-5號，2001年），以當年上海發生的婦女拐騙和救濟活動為事例，考察了婦女的社會地位。2003年，他還發表了〈上海商業教育的展開與新中間層的形成〉（《中國社會與

文化》，第 18 期，2003 年），闡述了近代式教育給中國所帶來的新社會階層。

高田幸男的〈明治期東京中國留學生面面觀〉（藤田直晴編，《東京：巨大空間的多重面相》，東京：大明堂，2001 年），根據臺灣國史館所藏《各省官費自費畢業學生姓名表》中 1908-1911 年間 2,970 名畢業生的籍貫、學歷、所在學校等資料，指出 90% 的中國留學生集中於東京，尤其是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和陸軍士官學校，很多人後來活躍於法曹界。該文首次為後人提示了留日學生的整體像。

金子肇繼 1997 年發表〈中國 1930 年代的同業公會與同業限制——以上海的工商同業公會為素材〉（《社會經濟史學》，第 63-1 號，1997）後，2000 年又發表了兩篇相關論文。一是〈袁世凱政權下的釐金改革與上海的認捐制度〉（上海史研究會編，《上海——重疊交叉的網絡》，東京：汲古書院，2000 年），一是〈清末民初江蘇省的認捐制度〉（《東洋史研究》，第 59 卷第 2 號，2000 年）。這三篇論文通過分析同業公會和釐金等工商稅制的關係，再現世界經濟危機下同業者限制的實態，揭示了中國的同業團體在團結問題上的弱點。近年，中國學界也開始關注這一課題的研究，但對金子肇等日本學者已經取得的成果，卻似乎還缺乏應有的關注。

笹川裕史的《中華民國時期農村土地行政史的研究——國家與農村社會相互關係

的構造與變化》（東京：汲古書院，2002 年），以土地政策為焦點，考察了國家和農村社會的相互關係。石島紀之的《雲南與近代中國——從「周邊」的視線出發》（青木書店，2004 年），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雲南通史。它旁及社會史和民族史，敘述了雲南在近代的發展，其中特別注重從民國誕生到抗日戰爭的歷史階段。

吉澤誠一郎在《天津的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 年）中，以天津的治安和社會福利制度為事例，考察了近代中國的價值觀和社會管理。其後，他推出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相關成果。其一，〈西北建設政策的始動——關於南京政府的開發問題〉（《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48 冊，2005 年）注目於中國的落後地區即西北內陸地區的經濟建設問題，重視作為開發對象的地區的人們的立場。文章指出，從來的為數眾多的西北開發計劃，幾乎都是紙上談兵。開發政策的真正始動，與獲得美國借款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作用和宋子文的縝密運作有緊密聯繫。時任陝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也一邊協助開發，一邊摸索如何處理開發計劃和生態環境的關係。其二，〈五四運動中的暴力與秩序〉（《歷史評論》，第 681 號，2007 年）將焦點對準五四運動中的暴力行為，通過分析輿論對襲擊曹汝霖住宅事件的反應，考察了民國時期城市大眾運動中暴力行為的意義。其三，〈天津的廟會與民間文化〉（李長莉、左玉河編《近代中國

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作為探索近代城市文化實態的一種嘗試，論述了1936年在天津復活的天后宮廟會。作者指出，當時的天津市政府為振興經濟而允許重辦曾被視為迷信而遭禁止的廟會，後人除重視廟會中的觀光因素外，還應看到其中含有的更深刻的意義。

另外，中國女性史研究會主編的《中國婦女的百年史》（東京：青木書店，2004年），是關於近現代中國女性史的概論。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主編的《中國女性史入門》（京都：人文書院，2005年），是一本比較新的基礎讀物。小林善文的《關於中國近代教育普及與改革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是教育史方面的論著。

（二）關於經濟問題

經濟及其相關問題，也是21世紀初日本民國史學界的研究熱點。而依據中國、日本和第三國的檔案和報刊史料，考察華盛頓體制下的國民政府如何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決定政策及實行政策，則是其特點。其中，荻原充的《中國的經濟建設與中日關係——走向對日抗戰的序曲（1927～1937年）》（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0年），以中日關係為中心，考察了國民政府時期的鐵路和煉鐵業問題。森時彥的《中國近代棉業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

出版會，2001年），從市場結構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國的棉業。菊池敏夫的〈1930年代的金融危機和申新紡織公司〉（前揭日本上海史研究會編，《上海——重疊交叉的網絡》，2000年），研究了申新紡織廠的危機應對過程。

飯塚靖的〈1930年代河北省的棉作改良事業與合作社〉（《駿台史學》，第112號，2001年），以河北省的棉作改良事業為個案，在究明其實態的同時，對國民政府的農業政策的歷史地位作出了評價。作者還指出，這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大規模的農事改良事業，既非純由政府主導，其內部也存有種種問題。

岡崎清宣的〈危機時期中國信用機制的重構〉（《社會經濟史學》，第67-1號，2001年），以華北的棉花流通及圍繞棉花的金融問題為事例，分析了民國時期舊金融構造的變化過程。

富澤芳亞的〈1937年的棉紗統稅調升與日中紡織資本〉（《東洋學報》，第82-1號，2000年），從中日兩國紡織資本的利害衝突的角度，考察了棉紗統稅的政策過程。

奧村哲的《中國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近現代史觀的重構》（東京：櫻井書店，2004年），是作者匯集自己的主要論文而推出的一本論文集。它從工業化、農村經濟、社會統合和國際關係的變化等角度，重新解釋了中國的近現代史。

久保亨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棉業與企業經營》（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著眼於支撐近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企業經營，以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以棉業為首的若干具體事例為個案，綜合地域史研究與經營史研究這不同的視角，考察了近現代中國企業經營的發展道路。

弁納才一在題為《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的研究——1930年代農村經濟的危機與復興的開端》（金澤大學經濟學部，2003年）的專著中，分析了民國時期在改良和普及棉花、蠶種，組織農業合作社方面的政策。其後，他又發表《華中的農村經濟與近代化——重構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像的嘗試》（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論述了華中農村的品種改良事業和土布業的發展。

天野祐子的〈中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糧食徵發——以四川省的田賦實物徵收為中心〉（《社會經濟史學》，第70-1號，2004年），考察了戰時糧食徵發所遭遇的困難及其對農村社會的影響。松本俊郎的《從「滿洲國」到新中國——由鞍山鋼鐵廠觀察中國東北的重建過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0年），以鞍鋼為事例，詳細論述了日本殖民地時代的生產設備在戰後的接收過程。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中華民國史時期的經濟統計——評價與預估》（東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2000

年），提供了關於民國時期的經濟統計數據等寶貴資料。

飯塚靖的《中國國民政府與農業社會——農業金融與合作社政策的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從省級甚至更低的縣、區、鄉鎮等基層的動向出發，對南京國民政府的農業政策及地域社會的反應，進行了多層次的考察。其成果可歸納為三點。第一，釐清了作為農業金融政策和合作社政策運作中心的中國合作學社的組織與活動內容。第二，究明了江蘇、浙江兩省的合作社的實態，指出了存在的問題。第三，揭示了江蘇、浙江兩省的農業金融政策及農業金融機關的活動，明確了其意義。

金子肇的《近代中國的中央與地方——民國前期的國家統合與財政》（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通過分析1912-1928年期間北京政府與江蘇省政府財政關係的變遷，釐清了中華民國前期的國家統合和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實態。作者認為，中國自專制王朝以來，基層的地方政府即握有國稅的徵收權。這種財政構造，使地方政府特別是省政府總是擁有向中央政府爭自立或割據的可能性。民國政府也繼承了這種財政構造，其國家統合的摸索過程因之受到制約。作者指出，上述傳統的財政構造一直沿襲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因此本書貫穿著一種通觀20世紀中國史的長遠的觀點。

（三）傳統研究領域的新進展

日本學界在致力於各種有關社會、經濟的具體課題的研究之際，在傳統的研究領域，也推出了不少值得注目的成果。

姬田光義編著的《戰後中國國民政府史研究——1945-1949年》（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1年）分析了國民政府戰後喪失大陸的政治過程，主張不能單純以「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史」的觀點看待戰後的國共內戰。

橫山宏章、久保亨、川島真主編的《從周邊看 20 世紀中國》（福岡：中國書店，2002 年），彙集了日、韓、臺、港等地學者從「中國之外」看中國的論文。家近亮子的《蔣介石與南京政府》（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2 年），是日本學界重新評價蔣介石的第一本專著。作者認為，國民黨基層組織的不健全，阻礙了其權力的滲透。該書在重新評價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同時，反思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觀（2005 年，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

菊池一隆的《日本的反戰士兵與中日戰爭——與重慶國民政府統治區的俘虜收容所相聯繫》（東京：御茶水書房，2003 年），結合對重慶國民政府統治區日俘收容所的研究，論述了在華日俘問題。

西村成雄的《20 世紀中國的政治空間——中華民族式國民國家的凝聚力》（東京：青木書店，2004 年），通過分析國民

國家的階段性和政黨國家體制的繼承性，強調了 20 世紀中國的連續性。西村成雄主編的《中國外交與聯合國的成立》（京都：法律文化社，2004 年），運用中方檔案，論述了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的外交努力及其對聯合國建立過程的影響。其中涉及到宋子文、顧維鈞的作用和美國、日本的對華政策。

坂野良吉的《中國國民革命政治過程的研究》（東京：校倉書房，2004 年），是關於國民革命的專著，其中認為國民黨的運動吸收了國民的運動。

川島真的《近代中國外交的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 年），以檔案為依據，從外交行政制度的確立、改正不平等條約的政策及其實踐、圍繞外交的中央——地方關係等方面，考察了近代中國外交的形成過程。此書獲得了日本三德利學術獎。（2012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其後，作者還發表了〈中國外交中作為象徵的國際地位——從海牙和平會議、國際聯盟到聯合國〉（《國際政治》，第 145 號，2006 年）；〈中日戰爭期間重慶的對外廣播及其內容〉（《軍事史學》，第 43（3-4）號，2008 年）。

中村元哉的《戰後中國的憲政實施與言論自由 1945-1949 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 年）指出，從訓政到憲政的轉變，不僅起因於憲政運動與國共對立等國內原因，還受制於國際原因，尤其是國民黨的

美國觀與五大國意識。作者證明，憲政移行期的中國言論界和出版界，儘管受到國民政府的限制，仍然展開了豐富多彩的議論。後來中村元哉還發表了〈近現代東亞圍繞外語書籍而展開的國際關係——以中國為中心〉（《中國——社會與文化》，第22號，2007年），從著作權的角度論述近現代中國的出版和媒體，分析了侵犯著作權的盜版書是在何種國際關係下產生，又受到何種處理的問題。

水羽信男的《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東京：東方書店，2007年），以羅隆基、施復亮為主，考察了1920年代至1949年前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中，這是第一部以自由主義為話題的專著。

深町英夫用中文發表了兩個成果。一為《近代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該書以廣州地區為主要對象，探討中國國民黨（包括其前身各團體在內）的整體組織，並把它定位於國家——社會關係的整體結構之中。作者試圖對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模式化、理論化的描繪，並重新思考中國國民黨及其所建立的政治體制的歷史意義。二為〈身體美學、公共意識與新生活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中卷，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8年）。該論文認為，中國國民黨雖在抽象問題上積極宣揚傳統中國的道德理念，但在具體行動上卻試圖通過近代西方人的眼光，由上而下地監視中國人民的身體，且「馴化」所有的個人，迫使他們也同樣遵守近代西方禮貌風習，從而被改造為近代國民。

石島紀之、久保亨編著的《重慶國民政府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是一本論文集。它考察了重慶時期國民政府的內政和外交。其中，土田哲夫執筆的〈中國的抗日戰略與對美「國民外交工作」〉，依據中美雙方的史料，論述了國民政府為促進美國援華制日而派員赴美指導和支持 ACNPJA 活動的史實。高田幸男執筆的〈重慶國民政府的教科書政策〉，結合戰時體制的構建，論述了國民政府的教科書政策，指出了無法把教科書國定化的國民政府的弱點。

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推出的《民國後期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研究》（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5年），也是一部論文集。其中，齋藤道彥執筆的〈孫文與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建國論〉，重新檢討了中華民國憲法的意義。姬田光義執筆的〈抗日戰爭中中國的國家總動員體制〉，從國家總動員的角度實證性的論述了國民政府的抗戰努力。土田哲夫執筆的〈抗戰時期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根據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等黨內資料，對抗戰以後國民黨的組織改

編、中央黨部機構和決策過程等等，作了制度論的探討，並分析了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的人事與派閥構成。

久保亨編著的《1949年前後的中國》（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是一本包含中國學者在內的集體成果。該書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多種角度，探討了中國在1949年革命前後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問題。

西村成雄、田中仁合編的《現代中國地域研究的新視野》（京都：世界思想社，2007年）和《中華民國的制度變化與東亞地區的秩序》（東京：汲古書院，2008），是大阪大學中國文化論壇的集體研究成果。二者都把中華民國史研究定位為中國地域研究的重要部分。

服部龍二、土田哲夫、後藤春美編著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東亞國際政治》（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7年）是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合作研究的成果。其中，土田哲夫執筆的〈國際和平運動與中日戰爭〉，以1936年所結成的「世界和平聯合」（RUP/IPC）為個案，檢討了抗日戰爭期間國際輿論的動向，和RUP/IPC的援華制日運動。

久保亨、土田哲夫、高田幸男、井上久士合作推出了《現代中國的歷史：兩岸三地100年的足跡》（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年）。它是一本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際關係等角度概述19世紀

末至今大陸、香港和臺灣三地時代變化的嶄新的通史。

（四）關於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水羽信男發表了兩篇論文，一是〈《新青年》雜誌上的辛亥革命〉（《地域文化研究》，第31號，2005年），一是〈自由在亞洲的行踪〉（日本孫文研究會編《孫文和南方熊楠——孫文誕生140週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前者在指出推進新文化運動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極低以後，分析了這一現象所包含的意義。後者以圍繞孫文自由主義的議論為話題，探討了其特徵。作者認為，孫文把自由主義理解為任性、放肆和為所欲為，這和真正的自由主義是兩回事，而孫文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是一種爭奪民族主義領導權的宣傳。

（五）關於中日戰爭與中日關係

在中日戰爭與中日關係研究方面，宇野重昭的《侵略的深入與抵抗的曲折——1930至1940年代中日關係的夾縫》（東京：研文出版，2001年），從政治、軍事和經濟、文化等多種角度檢證了日本的侵華政策。本莊比佐子、內山雅生和久保亨合編的《興亞院與戰時中國調查》（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考察了日本人所開展的戰時中國經濟調查。

安井三吉《從柳條湖事件到盧溝橋事件——1930年代中日兩國在華北的對抗》（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以華北為中心，論述了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中日關係。

古厩忠夫的《中日戰爭與上海及我本人》（東京：研文出版，2004年），涉及到戰時上海史和汪精衛政權等問題。內田知行《黃土的大地 1937～1945：山西省佔領地的社會經濟史》（東京：創土社，2005年），研究了戰時華北的社會與經濟。

平野健一郎主編的《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變化》（東洋文庫，2007年），由內田知行、三澤真美惠、天野祐子、貴志俊彥、川島真等執筆，分別論述了內蒙古的抗日政權與鴉片政策、戰時的電影管控、國民政府的新縣制、滿洲國的情報宣傳政策和華北的文化政策等問題。

笹川裕史和奧村哲合著的《槍口背後的中國社會：中日戰爭下的總動員與農村》（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根據現地調查所收集的資料，考察了當時徵糧、徵兵的實態及老百姓在慘酷的總動員體制下的生存狀況。

（六）關於中共黨史和革命史

在中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方面，石川禎浩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首先，他的〈國共合作的崩潰與共產國際——關於所謂五月指示〉（神戶大學文學部編，《神戶

大學文學部五十週年記念論集》，神戶大學文學部，2000年），以武漢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三者各自的因應為視角，剖析了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崩潰過程。論文依據斯大林書簡等第一手資料，不僅揭開了斯大林五月指示之謎，還就這一內容過激的文件為何會由共產國際代表洩露給汪精衛，提出了新的見解，指出其原因在於事關莫斯科提供的資金援助。

其次，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運用多方面的第一手檔案，從中國和日本、蘇聯、美國等國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國際契機著手，釐清了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推動下的創立過程。之前，因為缺乏原始資料，中共建黨初期的歷史，幾乎都是靠回憶錄提供輪廓。石川則在清算帶有強烈偏向的回憶錄中的謬誤的同時，運用日本和俄國保存的第一手資料，剔除了虛構，再現了史實。

另外，石川禎浩的〈走向農村革命的轉折〉（森時彥編，《中國近代的城市與農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1年）揭示了共產國際對中共轉變農民運動方針的影響。石川禎浩的〈初期共產國際大會的中國代表（1919～1922年）〉（森時彥編，《中國近代化的動態構造》，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年），考察了1920年代初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問題。石川禎浩的〈死後的孫文——遺書與紀念週〉（《東方學報》，第79冊，2006年），依據俄國

解密的檔案，究明了孫文「遺囑」和孫文致蘇聯政府「遺書」的產生過程。作者在確認「遺書」之真實性的同時，指出它的寫作手續與「遺囑」有異，是一種政治性文件。由於上述一系列成果，2008年，石川禎浩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獎」。

同一時期，平野正的《中國革命與中間路線問題》（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研究了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動向。江田憲治的〈中共黨史中的城市與農村〉（森時彥編，《中國近代的城市與農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1年），指出在中共內部一直遭到批判的「城市中心論」其實並不存在。丸田孝志的〈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根據地的象徵〉（《亞洲研究》，第50卷第3號，2004年），以共產黨領導人的肖像等為事例，再現了中共根據地的政治文化。田中仁的《1930年代中國政治史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危機與重生》（東京：勁草書房，2002年），用實證的方法，從革命戰略的轉變、白區的活動和領導人的主張等角度，多方面地考察了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實態。三好章的《摩擦與合作——新四軍（1937-1941）》（東京：創土社，2003年），研究了新四軍史，其中認為，皖南事件的原因之一是中共擴大根據地的政策。

（七）關於中國憲政史

在中國憲政史研究方面，味剛徹的《中國國民黨訓政下的政治改革》（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考察了訓政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在黨政關係、地方制度、省區規模、行政制度等領域所推進的各種改革，論證了它們的特徵與局限性。

金子肇在此期也發表了三篇相關論文：①〈戰後的憲政實施與立法院改革〉（姬田光義編著，《戰後國民政府史的研究》，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1年），②〈國民黨憲法施行下的統治形態——與孫文的統治構想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形態的對比〉（久保亨編著，《1949年前後的中國》，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③〈國共內戰下的立法院與1947年憲法體制〉（《近鄰》，第53號，2008年）。與過去的評價相反，作者在這三篇論文中認為，孫文的五權政府構想和專制體制具有親和性，中國共產黨的1954年憲法，也確保了執政黨的專制，而1947年民國憲法則維持了接近於總統——議會內閣制的三權分立的框架，即使加上臨時約款，實質上還是共和制憲法。作者還主張，實施憲政後的立法院，並非從屬於總統和行政院的全無力的國會，而且其在制度上一直發揮著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機能。

（八）關於人物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狹間直樹主編的《共

同研究 梁啟超》（東京：みすず書房，2000年），考察了梁啟超在亡命日本期間汲取西方文明的情況，肯定了他的功績。島田虔次編譯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全5卷（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在翻譯丁文江與趙豐田編著的以梁啟超的來往書信為主體的年譜長編的基礎上，加上了詳細的譯註，其中包括很多鮮為人知的記錄，因此該書被贊為研究民國政治史的寶貴資料。

此外，土屋光芳的《汪精衛與民主化目標》（東京：人間之科學社，2000年），分析了汪精衛。山口榮的《胡適思想研究》（東京：言叢社，2000年）重新評價了新文化運動後的胡適思想。松本英紀的《宋教仁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01年），從中央集權國家的建設及議院內閣制的建立這兩個視角評論了宋教仁。中尾友則的《梁漱溟的中國復興構想——對新仁愛共同體的模索》（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提出，梁漱溟的思想既吸收了西方近代學說，又保留著儒教的價值觀。鏡屋一的《章士釗與近代中國政治史研究》（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2年）考察了提倡復古運動的章士釗，認為章的政治思想是一種自由主義，特徵是主張反對活動的制度化和政治寬容性。佐佐木力的〈陳獨秀晚期思想的復甦〉（《思想》，第939號，2002年），分析了被中共除名後的陳獨秀的思想變化。

嵯峨隆又出版了兩本專著。一是《中國黑色革命論：師復與他的思想》（東京：社

會評論社，2001年），比較完整地分析了師復及其思想的特色。二是《戴季陶的對日觀與中國革命》（東京：東方書店，2003年），就戴季陶的對日觀及其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提出了新的見解。

五、最近的新成果和在日中國學者的日文專著

由於本文涉及的對象跨越三十餘年，時間長，範圍廣，人數多，所以從收集資料、汲取日方學者的既有成果，到進行補充調查和整理、執筆，整個作業經過了很長的過程。在這期間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又出現了不少新成果。但是，因為它們的價值需要經過時間的考驗，也因為筆者目前在時間上所受到的限制，對這些新成果，筆者只能就淺見所及，簡單介紹一下其中的部分著作。

（一）最近的部分著作

貴志俊彥、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合編的《摸索中的近代中日關係：對話與競爭的時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匯總了2007年11月在東京大學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其中涉及到蔣介石、閻錫山的留日經歷，北伐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和圍繞在華無線電權益的多國紛爭等問題。

久保亨、村田雄二郎、飯島涉合編的《20世紀中國史叢書》（東京：東京大學

出版會，2009年）共有4卷。其中，第1卷為《中華世界與近代》，第2卷為《近代性的構造》。它們論述了從清末到1949年的中華民國史，涉及到政治、外交、國際環境和經濟、財政、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等重要方面。第3卷《全球化與中國》，以1949年以後的歷史為重點。第4卷是《現代中國與歷史學》，概觀了中、臺、韓、美、日各方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現狀，並附有年表和文獻目錄等。

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編的《中華民國的探索與困境：1928-1949》（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10年）是服部龍二等9名學者的論文集，其中論述的問題有：國民黨治下的憲法制定活動、中共根據地的憲政事業、國民政府對雅爾塔密約的應對、顧維鈞與布魯塞爾會議等。

川島真的新書《面向近代國家的摸索：1884-1925》（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論述了從清末到民國初期，中國為成為近代國家而在「救國」及「國家體制」等問題上所進行的探索。

久保亨、嵯峨隆編著的《中華民國的憲政與獨裁：1912-1949》（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1年）是日本「民國史論會」推出的論文集。作者們從對中國第三勢力的評價、1944年重慶的訓政體制、無政府主義等方面，重新探討了1912-1949年間的憲政與獨裁問題。

村田雄二郎主編的《自由主義的中國》

（東京：有志舍，2011年）匯總了多名學者的論文，論述的主題包括1920年代中國的國家主義、1930年代中國的政治變動與政治學者、政治學教科書中的自由主義和媒體問題等等。

谷純一的《日軍接收圖書：中國日軍佔領區所接收圖書的行踪》（大阪：大阪公立大學共同出版會，2011年），考察了侵華日軍在華中佔領區、上海租界、香港等地對圖書的掠奪過程，並介紹了戰後日本對這些圖書的處理狀況。

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合編的《國際關係中的日中戰爭》（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1年），將焦點對準戰時外交與國際政治問題，在分析歐美列強的對外政策的同時，多層次地重新探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國際關係。

加島潤、木越義則等合著的《中華民國經濟與臺灣：1945-1949》（東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據點，2012年），探討了戰後大陸經濟與臺灣的互動關係，其中涉及到上海與臺灣的貿易、上海的棉布生產與臺灣、金圓券的發行與兩岸經濟等問題。

水羽信男的《中國的愛國與民主：章乃器與他的時代》（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以章乃器為個案，論述了他初期思想的形成、在救國會運動時期和抗戰時期的活動、和民主建國會的關係等問題。

家近亮子的《蔣介石的外交戰略與中日

戰爭》（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是作者關於蔣介石的第二本專著。書中運用蔣介石日記等新資料，重新評述了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及其意義。

深町英夫《管教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匯總了作者近年研究新生活運動的成果。書中，作者多角度地分析了新生活運動與中西思想的關係、其對國民黨派系政治的影響、其在抗戰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問題，並論述了中國各階層人民及日本人、美國人對該運動的反應。

山田成雄與松重充浩編著的《蔣介石研究：政治·戰爭·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12年）是日本蔣介石研究會的最新成果。書中匯集了17篇論文，均充分使用蔣介石日記和各種新資料，對蔣介石的日本留學、日本軍人的蔣介石觀、蔣介石的外交戰略與危機因應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新見解。

（二）部分中國學者的日文專著

行文至此，本文介紹的主要是日本學者研究中華民國史的成果。但是，如同前面已經提及的，在日本，還有一群由留學而進入學術界的中國人學者。他們雖然是外國人，但其留學以後所發表的論著，是受日本學術熏陶的結晶，在一定意義上也反映了日方的學術特色。因此在轉入結論之前，作為一種補充，筆者想以出版時間為序，簡單介紹幾

本中國學者在日本出版的與民國史相關的專著：

劉傑的《漢奸審判：對日合作者的命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在論述日本解決中日戰爭的謀略以後，分析了汪精衛一派的動向及中方產生對日合作者的背景，最後根據審判資料追蹤了戰後的漢奸審判。

筆者（鹿錫俊）的《中國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 1931-193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根據中、日等多種資料，考察了1931-1933年間的中日關係與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並分析了與之密切相關的國共關係等內政問題。

范力的《中日「戰爭交流」研究——以戰時華北經濟為中心》（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論述了戰時華北的產業結構及經濟統制，並涉及到戰時的勞動市場等問題。

李廷江的《日本財界與近代中國——以辛亥革命為中心》（東京：御茶水書房，2003年）以辛亥革命為舞台，論述了當時日本財界與中國的相互關係。

李曉東的《近代中國的立憲構想：嚴復、楊度、梁啟超與明治啟蒙思想》（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5年），通過和福澤諭吉等日本啟蒙思想家的比較，探討了嚴復、楊度、梁啟超三人圍繞立憲問題的構想，以及其後來在袁世凱帝制中夭折的過程。

段瑞聰的《蔣介石與新生活運動》（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年）從蔣介石的留日經歷、宋美齡的作用、德意兩國的影響等角度，考察了蔣介石所指導的新生活運動的發展過程及與抗戰建國的關係。

王元的《歸國留學生在中華民國權力構造中的地位》（東京：白帝社，2010年），在回顧近代中國人留學海外的經緯後，分析了歸國留學生在南京政府和中國社會的作用。

馮青的《中國海軍與近代中日關係》（東京：錦正社，2011年），以多方面的資料，在追蹤中國近代海軍的創建、發展、覆滅、重建過程的同時，分析了日本元素在中國海軍史中的作用。

張秋萍的《戴季陶與近代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11年）以探討戴季陶與日本的關係為主題，結合與上海輿論及孫中山的比較，在分析戴季陶的政治活動和思想特點的同時，論述了其日本觀的變遷過程及日本對戴季陶的意義。

在日中國人學者的成果還有很多，但由於篇幅上的限制，其他著作與論文就只能忍痛割愛了。

六、日方研究的特色與問題

在結束對日本學界民國史研究的回顧之際，有必要從整體上對之作一個簡要的總結。先談日本學界在民國史研究上的特色或

長處。

（一）重視以原始資料為基礎的實證性的研究

日本的民國史研究，最大特色是嚴格依據檔案等第一手資料，具體地、實證性地研究具體的問題。不具史料根據的空對空的議論，沒有立足之地；純理論性的說明，基本上也得不到學界的好評。近年大陸的民國史學者中，也有人開始驅使縣一級的檔案對具體問題作實證性的研究，但對如何借鑒日方學者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的業績，卻似乎還著力不夠。

（二）重視現地調查與史料收集

與上述特色緊密相關，日本民國史研究的又一個特色，是重視現地調查與史料收集。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英國，無論在南京、北京還是在臺北，凡是藏有民國史料的地方，我們幾乎都能看到有日本人在那裡孜孜不倦地閱讀或抄錄，其人數有時甚至超過本地的學者。而且很多日本學者在現地調查與史料收集上的奮鬥，已從中央一級的史料機構深入到省、市、縣一級的史料機構。另外，日本學者不僅努力收集史料，還注意對史料的考證，以去偽存真。與這種廣泛、深入的資料收集互為支撐的，是日本學者重視在中國的生活和觀察。很多日本學者都有在中國長期留學的經歷，精通中文。這種種努力，再加上日本自身收藏有包括各種調查報告在內的龐大的中華民國史資料，使他們

在資料方面自有特殊優勢，很多學者都能綜合使用中、日、英、俄等多種文字的資料。

（三）保有學問與思想的自由

從前述各節的回顧可知，日方學者對中華民國史的觀點和重視的程度，和其中國觀、時代觀的變化，以及對日本社會及中日關係的認識的變化密切相關。但同時他們都重視學問、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精神，不受政府立場的束縛，而日本的現行制度也保障了學者在民國史研究上的自由。

（四）團隊合作精神與老中青各代學人的傳承

歷史研究既需要大量彙集和消化史料，又需要具備與研究課題相關的專門學識和文化涵養。特別是 1980 年代以來民國史料的大量開放，意味著不花更多的時間、精力於消化史料，就拿不出與資料的開放水準相符合的成果。因此民國史研究既需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孤身奮鬥，又需要有相互取長補短的團隊合作。日本的民國史學者可謂同時兼備這兩種素質。具體就後者來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多種多樣的研究所發揮的作用。譬如，1980 年代以來，在民國史的整體性研究方面，有中華民國史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東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大阪）等學術團體；在民國史的具體領域的研究方面，有上海史研究會、天津史研究會等以地區為中心的學術團體，和經濟史、中日關係史等以專題為中心的學術團體。近

年，還成立了「蔣介石研究會」和「民國史論會」等研究會。所有的研究會，都是對民國史抱有共同興趣的人們的自發性團體，經費由成員的會費解決，運營亦由會員輪流負責。活動或每月一次，或每季一次，或不定期舉行。但其共同點，是老師與學生摒除地位上的隔閡，平等交流，相互批評，取長補短。通過這些活動，既交流了心得，分享了信息，推出了成果，又在老中青各個層次、各個領域的研究者的切磋琢磨中，完成了學術上的傳幫帶，不斷培養出新人才。

（五）研究的多元化和精緻化

日本的民國史研究，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主要是出於對以往的革命史觀的反思或反感，而以消除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政治性、主觀性為目標。但在經過 30 餘年的發展以後，現在已經進入到多元化和精緻化的階段。就前者而言，是研究的範圍超越政治史而更多地遍及到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衛生史、女性史、地域史、農村社會史、城市社會史、中外關係史等各個方面。就後者而言，是其研究的觸角不僅僅停留於對某一方面的政策、方針的探討，還深入至諸如疾病防治、消防團運營、婦女誘拐與救濟等各種細節。這種多元化與精緻化的特色，和日本學者不只是畢業於史學專業，很多人本出身於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等其他專業這一特點也有關係。易言之，研究者多學科的素養，促成了日本中

華民國史研究的「學際性」，而使之豐富多彩。（不過，從整體上看，和美國的中國研究不同，日方研究受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還不大。）

在上述特色的推動下，日本的民國史學界這 30 多年來對中國的近現代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論點，其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關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連續性問題

日本學者認為，以往過多地強調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差異或斷絕的一面，但對民國史的深入研究提示人們：必須在注意差異性一面的同時，更多地重視二者所具有的連續性的一面。首先，以一個革命政黨領導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開始於中華民國時期，以精英分子代替一般人民決定政策的「代行主義」，也是在民國時期就特別活躍。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恢復關稅自主、廢除租界、改正不平等條約、獲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等方面的成功，基本上都是以中華民國時期的成果為基礎。另外，以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為基礎的國內市場的統一等等成果，也是在中華民國時期就初步達成，現在臺灣的政治體制則仍然是建立在 1947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之上。總之，當代中國的正負兩個方面，都和過去的中國密切相關，因此中華民國史研究，一定要有不同於一般的斷代史研究的方法，而特

別注重各個時代的內在聯繫。

第二，關於中華民國的社會性質問題

「革命成功前的舊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和地主軍閥壓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觀點，在日本也曾經是一種佔主導地位的通論。但隨著民國史研究的進展，以經濟史領域的學者為中心，很多日本學者現在認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不符合國民政府時期的史實，而對官僚資本的批判，也值得商榷。因為所謂官僚資本和官僚資本家，或是國家經濟政策的承擔者，或是國營企業，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都發揮過積極作用。

第三，關於對民國政治的評價問題

與對民國時期社會性質看法的這種變化相呼應，現在的日本民國史學界，對包括所謂革命和反革命的兩大陣營在內的一切政治勢力，都摒棄了或褒或貶的絕對評價，而嚴格地根據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相對評價。譬如，在研究中華民國的農業和農村問題的學者中，過去視國民政府為反動地主階級政權的革命史觀已被完全推翻。但他們在肯定國民政府在促進農業和農村近代化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指出國民政府是一種城市型的政權，其對農村基層的滲透力很弱，未能充分掌握農民階層，這既限制了國民政府所推行的農業、農村近代化政策的效果，又成為中共建成其農村根據地的背景。

以上簡要概括了日本民國史研究的特

色、長處與最突出的新觀點。但是，同任何良藥都可能伴有副作用一樣，日本民國史學界的長處也同時隱含著類似副作用的短處或問題。以下著重談比較明顯的幾點：

（一）如何擺正微觀和宏觀的關係

同中國大陸與歐美的研究相比，由於日本學者更多地注重於對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的精細考察，因此在對民國史提出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觀點或理論性的總結方面，相對不足。在筆者的調查中，不少日本學者自己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譬如，橫山宏章指出，日本的民國史研究雖然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成果很多，但存在著「埋首於局部而忘卻通觀全局」的危險。姬田光義也強調日本學界應在注重與整體或全局的內在聯繫的前提下，開展對個別問題的實證研究。還有學者呼籲要加強方法論的探討及注意從世界史的視野考察民國史。總之，很多日本學者意識到，不能單純潛心於個別細節的精細考察而忽略對整體或全局的把握。

（二）如何加強中華民國史研究和日本史研究的相互合作

日本的民國史研究者在本領域內部雖然有很強的團隊精神，但和日本史研究領域的交流、合作則比較薄弱。反之亦同。在很長一個時期，日本史研究者幾乎不重視中國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和中文史料。這和過去日本的大學把史學分為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

三大講座，相互之間缺乏交流的傳統有關。因此儘管過去有過類似《中國的幣制改革與國際關係》那樣的合作之果，現在也進行著關於歷史認識問題的多領域學者的共同作業，但就整體而言，它們還屬於個別性的現象。這種現狀亟需改善，因為日本的近現代史幾乎事事與中國相關，中國的近現代史也幾乎處處同日本相連。只有把二者結合在一起協心攻關，互為補充，才能同時推動兩個領域的共同進展。

（三）如何促進政治史、外交史研究與社會史、文化史等其他領域研究的平衡發展

如前所說，在革命史觀盛行的時期，日本的中國研究偏重於政治與外交，這確實是一種應該克服的偏差。問題是如姬田光義在《中國革命史私論》（東京：櫻井書店，2000年）指出的，在民國史研究進入多元化和精細化後，現在出現了另一種偏向，即對政治、外交領域的輕視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的邊緣化現象。這種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必須及早克服。因為過去雖然重視政治史與外交史，但無論在史料上還是在觀點、方法上都受到嚴重的限制。就後者來說，主要表現為兩點：其一，缺乏從總體上全面把握國際政治的視野，沒有把中國作為國際政治的主體，而只是視之為日本政治外交的客體；其二，只著眼於外交和內政的相互影響，而沒有從中國本身的內在規律出發。易言之，過去的偏重

政治史、外交史，不等於已經完成了政治史、外交史研究。恰恰相反，在傳統觀點方法的束縛已經瓦解，以前無法利用的寶貴史料也已大量公開的今天，必須充分運用新方法、新史料，進一步加強對民國政治與外交的研究，才能真正掌握民國史的全般真相。但另一方面，石川禎浩指出，要真正做好政治史或政策史的研究，一定要有顧及到文化史、社會史等領域的綜合性的視野，否則就難以取得突破。與之相關，還有學者認為，日本學界對民國期間的香港、臺灣和「滿洲國」地區、西南與西北地區、邊遠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研究比較薄弱，對軍事史、被佔領地區的歷史及傀儡政權的歷史也關注不夠，今後都需要加強之。

（四）如何避免在史料的大海中沉溺於「精英史觀」

這是奧村哲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提出的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他說，第一手史料的大量開放固然是好事，但也伴有令人在史料的大海中無意中陷入「精英史觀」的危險。因為能夠為後人留下史料的，大多是各個領域的領導者、政治家、資本家、知識分子等所謂精英人士及他們所活躍於其中的機構或團體，而過去被稱為「人民」的廣大的無名老百姓，則幾乎都沒條件留下自己的史料，或者退一步說，即使偶爾能留下一點東西，也都是零零碎碎的斷片，不像精英們的史料那樣具有系統性。因此如果研究者不注意自

己所面對的史料大海的這種局限性，並自覺地去克服這種局限性，所寫出的就只能是「精英的歷史」，或「精英眼中的歷史」。這就是所謂「精英史觀」，它離真正的歷史尚有很大的距離。正是出於這種認識，奧村哲和笹川裕史合著了前面提到的《槍口背後的中國社會》。如果讀一下這部著作，當能在克服「精英史觀」上得到啟發。

（五）如何克服「大學法人化」和「研究經費競爭化」等變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進入新世紀以後，隨著以大學法人化和研究經費競爭化為中心的改革的深入，日本教育、研究人員所處的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課時增加，雜務增多，壓力增大。這種在某種程度上以「量」為標準的新環境，對於特別需要時間和安靜的歷史研究者的衝擊尤其嚴重。隨之，目前在史學界，也開始出現了重量輕質、重爆冷門輕深入挖掘、重易得經費的現實課題輕吃力不討好的歷史課題等傾向。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純學術問題因得不到經費資助而無法順利進行；一些有比較充裕經費的研究項目，又因為急於多出數量和消化經費而忙於舉行形式式的會議。

日方學者在中華民國史研究上的特色和既有成果，值得我們充分重視與借鑒。他們今後如何在環境的變化中克服自身的短處或不足，也值得我們充分關注與參考。

謝辭：

下列各位學者在百忙中接受了筆者的問卷調查，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寶貴的素材。敬記芳名，以示衷心感謝。（以姓名的日語發音為序）

味岡徹 飯島涉 飯塚靖 家近亮子 石川禎浩 奧村哲 金子肇 川島真 久保亨 齋藤道彥 嵯峨隆 高田幸男 田中仁 土田哲夫 中村元哉 姬田光義 深町英夫 水羽信男 橫山宏章 吉澤誠一郎 山田辰雄

主要參考文獻（以出版年月為序）

- 坂野正高等編，《近代中國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
- 山田辰雄，〈今こそ民國史觀を〉，《近きに在りて》，第17號（1990年）
- 野村浩一等編，《岩波講座現代中國 別卷2 現代中國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
- 辛亥革命研究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
- 山根幸夫等編，《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東京：研文出版，1992年）
- 小島晉治等編，《近代中國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
- 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國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
- 小島晉治、大里浩秋、並木賴壽編，《20世紀の中國研究 その遺産をどう生かすか》（東京：研文出版，2001年）
- 〈特集 中國近代史研究へのアプローチ〉（《歷史評論》，第638號，2003年6月）
- 〈小特集 近現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中華民國〉（內含：久保亨，〈今日の中華民國史研究〉；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國際政治史研究の可能性〉；吉澤誠一郎，〈中華民國史における「社會」と「文化」の探究〉；奧村哲，〈民國期中國の農村社會の變容〉等）（《歷史學研究》，第779號，2003年9月）
- 黑田日出男等編，《日本史文獻事典》（東京：弘文堂，2003年）
- 田中比呂志、飯島涉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のスタンダード》（東京：研文出版，2005年）
- 飯島涉、田中比呂志編，《21世紀の中國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
- 礪波護、岸本美緒、杉山正明編，《中國歷史研究入門》（特別是其中由久保亨和江田憲治執筆的第11章「現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年）
- 岸本美緒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 末廣昭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6卷：『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 〈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每年的5月號）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東洋學文獻類目》

【註釋】

1. 譬如，渡邊長雄的《中國資本主義與戰後經濟：國共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50年），對國民政府有較高的評價。村松祐次的《中國經濟社會形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49年），根據滿鐵的調查資料，主張中國具有獨自的社會形態，反對單純接受中國共產黨的見解。